王巍：青年考古人的一个发现，也许改写历史

者探源

编者按

所有博大精深的文明，都有它萌芽时的万千可能；所有殚见洽闻的文明探源者，都有他出发时的懵懂探索。即日起，国学开设“探源者说”专栏，邀请考古文博学界的大家学者，讲述他们与中华文明初遇时的青春故事，有关青春，有关梦想，有关风尘仆仆满载而归时的不忘初心、依旧少年。

王 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巍

本组图片均由王巍提供

我从事考古工作整整40年，研究过东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带队发掘过河南偃师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陕西周原的西周宗庙遗址、安阳殷墟……我可能是考古界得到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最多的人。

1995年，我在日本发表了第一篇博士论文，关于中日古代王权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九州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后，广岛大学就给我递来了橄榄枝，聘请我做副教授。我算了算，年薪折合人民币有30多万元。

那时候我在国内一年工资不到3000元，整整100倍，确实很有诱惑力。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觉得，既然学的是考古，就要研究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程度，日本没法儿比。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谢绝了，回国走上了我的考古之路。

当过钳工，自学几何，终于考上了考古

1954年，我出生在东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去的时候正好是1月，冰天雪地，屋外冷，屋里也冷，大家都戴着帽子睡觉。两年后，抽调回长春的工厂，我又当了5年工人。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已经23岁的我报名参加。当时是先考试后报志愿，在选择志愿的时候，我原本希望报理工科，但想到自己只读了一年半初中，数理化的知识恐怕不够。这时，一个熟识的长辈对我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不妨考虑。

其实那时候我对考古没有什么概念，但看过一部纪录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里面有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中国的文物如此丰富多彩，又想到考古可以走南闯北，开眼界、长见识，所以，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考文科也要考数学，而我初中的那点儿数学知识估计是考不上吉林大学的。幸好，在工厂做学徒的时候，我学的是钳工，钳工需要掌握平面几何知识。当时我的妹妹在读初三，我就跟她学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和三角函数。靠着这段自学经历，我的数学得了35分，这35分让我能够进入吉林大学，让我能够学习考古。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一句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是1979年春天，在河北张家口市蔚县的筛子绫罗遗址做考古实习。当地是贫困村，农民干一天活只能挣几毛钱。我们住在老乡家，条件很艰苦，睡土炕，炕上有虱子跳蚤，也没有地方洗澡。没办法，我就让妈妈给我缝了两个口子可以扎紧的褥单，这样虫子就进不去了。

那时候，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考古。我们在附近的供销社买手套等劳保用品时，开发票，他们把考古队的“古”，写成了“骨”，令人哭笑不得。

探究文明源头的工作仍在继续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工作生涯中，我发掘的第一个遗址，是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一干就是5年。然后，我就被单位派到日本留学了。

在日本期间，我惊讶地发现，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几乎都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是传说。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作为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事实上，我关注中华文明起源，要早至1983年。那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出版。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都有大量考古新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

从日本回国后，我遵从张忠培先生“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1996年8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在当年秋天率队对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群进行大规模发掘。恰巧从1996年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作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参加断代工程。2002年至2016年间，我又领衔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如今，探究文明源头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日本学习的3年时间里，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十分发达，考古事业十分兴旺，大众对考古很感兴趣，考古学家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我看到当时日本的考古已经开始运用计算机和各种测量仪器，考古工作者拥有很好的国际视野，也积极地向大众传播考古成果，这些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这段学习经历，一方面，我学到了日本考古学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另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中国考古学可以从日本考古学中借鉴的东西，感受到了中国考古未来的方向。所以，后来我回国、又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之后，就把推进考古的科学化、国际化和大众化，作为努力的方向，也颇有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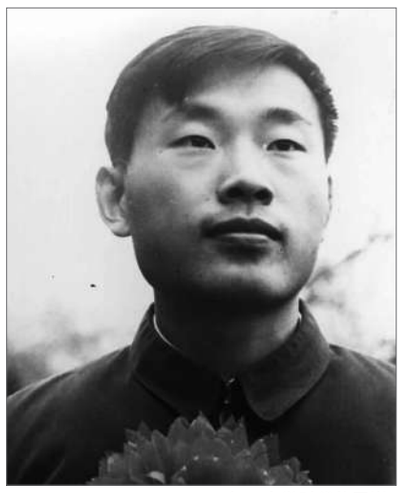
考古的独特魅力：给人期待、给人希望

考古这门学科，经常需要人在野外翻山越岭、日晒雨淋，有些像地质学，但考古又有它独特的魅力，它给人期待、给人希望。虽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遇上三星堆，但每一项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学术任务、学术目标，通过自己的发掘调查，总会有收获。

一个很有名的考古教授干了一辈子，但他发掘的墓葬从来没有出过青铜器，在他快60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宝鸡石鼓山（该墓地出土了92件青铜礼器，是中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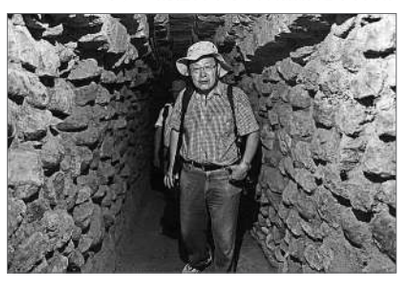
考古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初出茅庐的青年考古人，某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也许就会改写历史。比如，郭沫若、夏鼐等著名学者，依据当时看到的考古资料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几乎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难以解决的。

考古研究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每一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都会让国人、乃至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是多么丰富多彩、灿烂辉煌。而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1979年，大学时代的王巍。

1989年，王巍在日本奈良发掘藤之木古坟。



2016年，王巍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玛雅王陵。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延绵五千年，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人生观价值观，都可能在考古发掘中找到它的原型，梳理出它的传承脉络。所以，考古学家看待万事万物时，会拥有一个历史纵深的眼光。

考古学家在发掘的时候，会感觉在和祖先对话。比如，发掘一个居住遗址，房子当中有一个灶，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可能有一个三四口之家，围坐在灶炕边，取暖、烧烤；屋内其他地方比较平坦，可能是他们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些正在制作中半成品的石器、玉器，那会不会是儿童的玩具呢……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让我上了大学，开放让我走出国门看世界。我也希望更多海外留学的学子，将来能够学成归国，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中华民族的发展，这是我的心里话。

现在回想，当初回国的选择非常对。在国外发展再好，也不如在自己国家研究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的意义更大。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是30多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年轻人在做人生选择时候，要考虑长远而不是一时。

考古是一个朝阳学科，国家越来越重视，大众越来越感兴趣，考古学家和考古新发现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现在，我们考古科技的设备和水平，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比肩，年轻人大有用武之地。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考古队伍，加入这样一个既有挑战又有光明前景，肩负重大责任、又能实现个人价值的专业领域。

（蒋肖斌根据王巍口述整理）

诗文切磋古人

张 侃（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郑鹏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想必大家对这篇《兰亭集序》都不陌生。“修禊”原本是祈福禳灾的仪式，不过王羲之等人借此机会举办雅集，饮酒作诗，畅叙幽情。文稿结集后，乃有王羲之所撰的这篇序文。

雅集是中国传统文人吟咏诗文、切磋学问（以及吃喝玩乐）的聚会。不过雅集是偶发的、短暂的。如果对雅集日常化、规范化，就变成了“社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人群体，为了相近的学术理念而结成社团，甚至有固定的集会地点，常年聚会以探讨学问，砥砺技艺。

明代中晚期社集云起，出现了诗文社集、心学讲会和制艺文社等不同类型的社集。约以万历末年为界，之前是前两类社集风行的时期，之后是制艺（八股文）风行的时期。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各类社集为窗口，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思想文化风潮及其嬗变交替的过程，而这又与王朝政治、阶层秩序、地方社会等因素有莫大的关系。《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一书就是讨论相关问题的一部力作。

谁来结社？

所有的社团都有组织者，所以首先要叩问的是，谁来结社？

传统的结社研究，通常将声名卓著的文人士大夫置于结社活动的主流地位。如谢国桢研究明代复社，先讲张溥和张采，两人因驱逐魏忠贤义儿顾秉谦于昆山，所以郡人集资为之立碑刻石，“天下咸重”。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应社、复社以参与政治、反对阉党为要旨，自然需要这样的群伦领袖。

然而，明代除了南京、苏州这类全国文化中心城市，普通的地方州县亦存在大大小小的各类集社。譬如书中提到的漳州、衢州、温州、金溪等地，这些都是位于边缘地带的府县。

漳州霞中社的组织者是地方士人张燮，而同时又邀请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李楷、宗孟。这是因为在万历年间，税珰（掌管税收的宦官——编者注）高寀在地方横征暴敛，霞中社欲以军政要员与之制衡。衢州士人方应祥亦非文坛主流，只是一个以科举制艺为生活重心的普通士人。但因制艺写作技巧高超，以及对制艺亦当文以载道、传达圣贤精神的理解，他成为衢州倚云社、杭州小筑社的核心人物。

温州的山人群体结社更为有趣。明中后期，江南山人文化传入温州，普门张氏、英桥王氏、七甲项氏、李浦王氏等永嘉场大族的世家子弟，纷纷以“山人”自称。山人结社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以文化资本博取地方政治资本和社会控制话语权的新机制。江西金溪的“小读书人”，更是一群二流的、虽有著作但几乎皆已不存的地方文人，但他们往往在当地扮演重要角色，是地方社集的主要成员。

总而言之，不同于以文坛领袖为核心的传统研究，本书对各类不同人群的关注为结社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如何结社？

崇祯年间，衢州人徐日僎为族兄福建左参政徐日久编纂文集时，特意分出“游记”一类，强调士人出游的必要性。同乡方应祥亦有类似体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游历、交友、写文中度过。而科举制下，乡试在省城举办，更促进文人集社往高级城市的集中。

温州的山人集社则呈现另一面貌，其生活中心逐渐从乡村转移到城郊或坊市之内，并兴建园林，借以举办社集，炫示文化意趣。温州山人邀请曲艺高手，豢养男童小史（即私人置办的戏曲人员）和女伎，造访高僧大德、修习佛法。他们的集社内涵丰富多元，不似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结社，实是区域流动性不足状态下的地方社交圈层活动。

晚明时期，政治、军事是社会议题的焦点。南京城里的士人们如火如荼地开展结社活动，激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而这种激情的结社场景实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繁荣来支撑。

清初，清朝以故明历史教训为鉴，限制集会结社，另一方面入清之人亦有“安身立命”之忧，所以当时士大夫官员皆讳言结“社”，多以“文酒会”称之。这种“文酒会”已经与晚明文社大不相同，内容以“好古鉴赏”为主，实际上是另辟蹊径，以延续儒家经世观念，只不过不再形成高头讲章般的论述文字罢了。

为何结社？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何结社，这关系到文人社集的旨趣。一般印象里，文人结社是为了吟咏诗文、切磋学问，是为纯粹的学术活动和风雅之举。然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科举仕进是传统时期最重要的阶层晋升渠道，以科举为目的结社所在多有。

譬如晚明山阴县人祁承㸁参加的合辙社，就是为研讨经义、备考科举所设立的。这一方面可以在研习举业之余，以诗文唱和缓解痛苦；另一方面还可以共同揣摩科举作文的技巧，提升考试能力。

与之相对，在重阶级、身份的日本传统社会，没有类似中国科举制度的阶层晋升通道，游学、结社就成了普通读书人追求学问、建立人际关系和提升身份地位的途径。民间社集则使武士、町人跨越身份藩篱，得以自由交流，忘情于风雅世界。

同一地的社集也存在前后变化。扬州崇祯年间的直社和清初的丁酉诗社、夏声社，是由一群在扬州的秦地文人结成的。直社的旨趣在于确立“正确的”学术、移风易俗。在这个过程中，士大夫身份和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被不断强调和复制，与两淮盐商之间的身份区隔则被凸显。经过清朝对结社的打击，丁酉诗社和夏声社不再关心复古，而是转向“力振秦风”。也就是说，作为晚明江南浮华文化的对立面，秦地文人以“吾秦”来建构身份认同。

总的来说，结社是一种以诗文酬唱、研习经典形式进行的文艺活动。不过，一旦结社和政治扯上关系，就容易变成“党”。明代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又有诸多官僚、士人加入，往往谈论国事，遂成“东林党”。东林党与浙党、楚党等派意见不同，演变成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的党祸。

清初，清世宗雍正下令严禁结党营私：“凡为臣子，但当砥砺品行，奉法尽职，不可遇事生疑揣度，致开党与之渐，如明末群臣背公行私，党同伐异。”（《清实录·世宗章皇帝实录》）这个说法确有道理。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文人在18世纪中叶变成了法国的首要政治家。当时文人提出以理性和自然法则来取代复杂的传统习惯，而愚昧的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上流贵族也支持文人的思想理论，沉溺其中。然而，“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法国大革命最终摧毁了这些陈情改革（实际上是革自己的命）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学人可不慎欤！

赛龙舟，从两千年前乘风破浪而来

赛龙舟。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6月2日至3日，时逢端午佳节，“龙腾虎跃”2022海峡两岸赛龙舟活动在福建厦门举办，24支大陆队伍和17支台胞队伍，展开龙舟竞渡。赛龙舟，这一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民俗活动，2000年来，风采依旧；赛龙舟，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的背后流淌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灭的身影。

文献记载的龙舟竞渡，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战国中期的《穆天子传》，“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而1935年在河南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铜鉴，和1965年在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赏功宴乐铜壶”上，都有赛龙舟的图案。

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节俗，赛龙舟往往被视为“救屈原”的象征。南朝《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但自隋朝开始，就不断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怀疑。到了现代，闻一多在《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等论文中，认为赛龙舟是以龙为图腾的古代越民族，在年复一年的为娱图腾神的竞渡活动中形成的。

俗话说，“北人赛马，南人竞渡”，这里的南，遍及长江以南。民俗活动总是与本区域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地域辽阔，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山川河流，不同地域的古人在历史进程中，为龙舟赋予了不同的传说。

比如，吴国是为了纪念伍子胥，越国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湖北的秭归和荆州，自然是为了纪念屈原；广东、福建、台湾一带，则源于对龙的祭祀活动和驱瘟辟邪的原始保健文化；云贵高原一带的苗族、侗族、白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也喜欢赛龙舟，纪念各自的英雄。

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龙舟竞渡逐渐发展为风靡南方（限于地理条件）的传统体育活动，与历史上几次民族大融合是分不开的。

而随着社会发展，龙舟的“龙”逐渐消退了“神性”，成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象征。鼓声起，龙舟发，人们通过这些活动，传达着一个共同的朴素愿望：期盼未来的美好生活。崇尚集体协作的龙舟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粘合剂”，将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集聚在共同的文化轨道。

如今，湖南省沅陵县、广东省东莞市、贵州省铜仁市、贵州省镇原县的“赛龙舟”，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龙舟说唱”，浙江省杭州会西湖区的“端午节（蒋村龙舟胜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端午节（大澳龙舟游涌）”……十余项与龙舟相关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任何一种民间文化从诞生那天起，流传或者淘汰这两种命运就摆在眼前。而能生机勃勃地流传下来的文化，一定是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不是口头认可，而是自觉从事。龙舟文化，正是一个传承着的、拥有无限生命力的民间文化。

1984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把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85年6月6日，中国龙舟协会成立，一时间，各省、市县相继成立了专业的、业余的龙舟队伍。香港在回归五周年时，在维多利亚湾举办了盛大的国际龙舟赛；台湾的端午节十分隆重，往往提前一周就开启各种庆祝活动，基隆河上的龙舟竞渡更是年年举办；“2022澳门国际龙舟赛”于5月29日至6月3日举行。

龙舟也正在“划出亚洲，走向世界”：2010年广州亚运会，龙舟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8月3日，东京奥运会皮划艇静水项目首个决赛日，三条龙舟在比赛间隙亮相海之森水上竞技场，这是龙舟作为表演项目，首次被列入奥运会。

历代诗人们不吝笔墨，记录下了百舸争流的盛景：“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唐·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唐·储光羲《观竞渡》）；“看龙舟，看龙舟，两堤未斗水悠悠。一片笙歌催闹晚，忽然鼓棹起中流”（宋·黄公绍《竞渡櫂歌》）；“五月五日岚气开，南门竞船争看来”（宋·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九首·其一》）；“竞渡齐登舢板船，布标悬处捷争先”（清·钱琦《台湾竹枝词·竞渡》）……

当条条龙舟在江上争相进发，中华民族也从不畏惧风浪，在乘风破浪中驶向未来。